

2. “现代性”或“欧洲中心主义” ——对比土耳其与中国的语言改革¹

易蔚洋 (Derin Bohcaci)

摘要: 本文讨论 20 世纪初中土两国对现代性的看法背后的殖民话语, 以及这些看法如何在各自的语言改革运动中得以体现。我首先概述中国和土耳其语言改革的历史, 并通过比较批判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两国的语言改革是如何在内化的东方主义刻板印象中进行的, 并展示殖民话语对两国的现代语言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尽管形式上的殖民时代已经结束, 我希望本研究能够引起人们对全球殖民历史仍然嵌入当代社会的关注。

1. 前言

本论文将论证 20 世纪初土耳其和中国对现代性的理解, 以及与殖民主义的直接联系。通过使用批判性比较视角来分析两国当时的语言改革, 并证明两国的改革都受到了“殖民话语内化”的影响。通过认识到我们至今所追求的“现代性”其实是殖民主义的果实, 土耳其人和中国人以及其他殖民地人民便可以开始践行真正解放文化的大使命。

2.1 背景

自 1990 年代以来, 凯末尔主义主导的土耳其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一直在经历一种智识上的“文艺复兴”, 但结果是在这两个社会中都出现

¹ 本文是作者易蔚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文四级 (LN240, 2023–2024) 课程中的论文, 经过缩减和修改。所有英文引用的翻译均由作者完成。指导老师为施黎静博士。

了一种“保守”的文化政治。凯末尔主义提出了一种沿现代化方向重塑社会的理念，旧价值观的瓦解并被新价值观所取代。中国也有类似的文化项目。可以妇女解放为例，因为两个国家都追求了女权主义的目标。在中国，妇女被推进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成为了国家政策的一部分 (Zheng, 2010)。同样，土耳其妇女也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White, 2003)。从文化上讲，土耳其和中国的两种意识形态在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进步等价值观方面是进步的。然而，伊斯兰主义和新儒家等保守的文化意识形态在这两个社会中正蓬勃发展。这些思想流派希望通过回顾前现代时期，以寻找解决当前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灵感。它们希望创造一个根植于传统思想的，却有具有独特现在性的土耳其或中国，其前提是拒绝西方思想或一切被视为西方的东西。然而，这些保守的范式虽然抵制了西方帝国主义，但也带来了诸如压制妇女等文化问题。Ahmad (1988年)描述了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如何威胁妇女的自由，而Gao (2003年)则强调了儒家思想的性别歧视性质。正是响应这些社会文化趋势，我开始了对这两个国家现代性形成的调查。

2.2 研究问题

我的研究问题：中土两国的语言改革如何在各自的语境中诠释“现代性”概念？

2.3 研究方法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采用了批判性的比较视角。这一视角的“批判”部分来自 Ricento (2006年)对许多语言政策研究未对“基于西方的关于国家发展前提的意识形态，比如单一语言主义”所提出的批评。在此基础上，我还接受了 Blommaert (2006年)得出的结论，即在国家建设中，单一语言意识形态和标准国家语言的必要性是一个谬论。Silverstein (1996年)进一步论述了“单一语言”社会的观念也是欧洲的发明。我还从 Pennycook (2006年)的观点中得到了启示，即“现代语言”作为一个具有清晰界限和结构的实体的概念，是一个近期在欧洲产生的构想，在全球化之前产生。所有这些思想都呼应了著名的后殖民主义学者 Spivak 的观点 (1988)。她认为，将欧洲中心主义的范畴强加于殖民地人民应被称为“认识上的暴力”，因为西方知识取代了非西方知识。这些作者主要是要探索为什么政策制定者首先选择他们想要追求的目标，这些改革持有哪些价

值观和观念，导致他们制定了某些目标。

这一批判性比较视角的“比较”部分来源于 Anderson 的方法论（2016年）。他提出了四个原则：1）比较时，必须突出支持论点的相似性或差异性。2）使用令人惊讶的比较，即通常不会被比较的国家或地区。例如，与其比较法国和德国，不如比较法国和印度。我之所以选择比较土耳其和中国是因为它们通常不会被纳入比较分析。3）比较同一国家的政策在不同时期的演变。4）比较时牢记自己的背景。

以下是我根据这两种框架的结合所得到的主要发现。

3.1 土耳其语言改革的殖民基础

土耳其语言的改革可追溯到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当时的土耳其领导人阿塔图尔克建立了一个由共和人民党领导的一党制国家，并启动了一系列改革，旨在将新共和国推向现代化。他认为前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的崩溃是由于其落后的状态。从 1920 年代到 1945 年（一党统治结束）期间他所推行的改革之一是语言改革。该语言改革旨在规范语言，改变其文字，并取代“奥曼土耳其语”而成为标准语言。牛津大学土耳其研究系创始人 Geoffrey Lewis 宣称（1999 年），阿塔图尔克是推动土耳其“现代化”的政治动力中最重要的人物，因此我将探讨他所推行的语言改革中的两个方面，即标准化和拉丁化。语言规划者在构建现代土耳其语时使用了欧洲的“纯净”语言概念。在构建土耳其标准化语言时，语言规划者的目标是消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语法特征和借词。Pennycook（2006 年）认为，“纯净”语言的概念是欧洲的概念，即语言之间存在边界。Lewis（1999 年）在对土耳其的报纸进行分析时发现：1931 年只有 35% 的词汇是土耳其衍生的。到 1965 年，土耳其衍生词的比例达到了 60.5%。土耳其语衍生词的增加表明非土耳其语衍生词从土耳其语中消失了。这种在标准化过程中对土耳其的“净化”具有欧洲根源，本文稍后将进行探讨。现在，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文字改革。

从 19 世纪末开始，奥斯曼文字被普遍认为是阿拉伯文字的修改版本，不足以代表土耳其语。在阿拉伯文字中，只写下辅音，而不写元音。然而，在土耳其语中，元音被广泛使用，省略它们会产生歧义（Mignon，2010 年）。然而人们不能决定如何改革文字：可以改革奥斯曼文字使其更好地表示土耳其的语音学，或者转而使用亚美尼亚语或希腊语字母，因为这些字母当时在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被广泛使

用。然而，在1928年，阿塔图尔克不顾语言委员会的建议，径自宣布了拉丁化，并得以实施。目前，在土耳其只有专业学者可熟练使用奥斯曼文字。牛津大学教授 Laurent Mignon (2010年)认为，这是文学史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巨大机遇，因为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国家”文学经典。他们可以塑造现代土耳其的图书馆，切断其与伊斯兰的历史联系。Lewis(1999年)还认为，拉丁化的决定也是因为土耳其想要西方化，既表现得更加西方化，又将土耳其的智识意识转向欧洲，而远离伊斯兰世界。

为什么会在土耳其发生这种情况？为什么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决定他们的语言（奥斯曼语）不适合现代化？他们为什么选择了这些具体的改革？这些问题跟当时的“东方主义”视角有关。历史教授 Edhem Ertem (2010年)认为，西方观察家的东方主义陈词被土耳其精英内化，然后由他们复制。土耳其政治家和思想家试图通过变得西化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因此，要么拒绝他们认为“低下”的文化，要么通过无法撤销的方式改变他们的文化和语言。其直接后果就是：我作为一个土耳其母语者，由于土耳其语言改革的剧变，无法阅读80年前我先人们所写的文章。在许多方面，土耳其社会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已经西化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伊斯兰教徒的幻想“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完全不现实。

3.2 中国语言改革的殖民基础

中国语言改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当时许多思想家将中国语言作为改革的主要对象(Tong, 2000年)。在本节中，我将重点关注汉语书写的标准化和文字改革。

在20世纪之前，标准书面汉语被称为文言文。它基于两千多年前的古汉语。在方言多样的中国，它非常有用，因为受到教育的人会使用文言文，但说着自己的方言。然而，学习文言文需要很多精力，被认为不适合现代社会。“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白话文开始成为标准的书写方式，因为它直接对应了汉语口语。正如Tong(2000年)所述，从文言文作为国家语言转变为白话普通话，是引入了对中国来说是外来概念的音素中心主义。音素中心主义意味着一个社会更重视说话而不是书写。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强的动力，认为“中国语言的欧洲化”将增强中国的表达能力、语言准确性，并使其更适合现代化(《牛津汉语语言学手册》，2015年)。

围绕文字改革的过程更加复杂，但尤其值得指出以证明我的观点。

Tong (2010 年) 强调新文化运动中重要人物, 如鲁迅和瞿秋白等人, 都支持汉字拉丁化。许多思想家希望为汉语创造一个语音系统, 因为他们认为汉字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幸运的是, 这些替换汉字系统的呼声被忽略了。然而, 展示许多高知名度的思想家想要拉丁化的事实很重要, 因为表明了当时思想界的普遍观念。虽然汉字得到了保留, 但在后来的岁月里它们经历了多次修改。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 1956 年首次发布简化汉字的标准方案。在此基础上 1964 年又公布了一般列表(《牛津手册》, 2015 年)。

与土耳其案例研究类似, 人们必须问, 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统治者决定他们的语言首先需要改革呢? Arif Dirlik 教授(1996 年)是这样回答的: 他认为东方主义观念已经成为中国自我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Tong (2000 年; 第 19 页) 特别指出, 中国社会的精英热情地拥抱西方的东方主义思想。他还认为, 已经确立的西方东方主义者对中国语言的看法与“五四运动”时期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延续性。正是这些殖民意识形态指导了中国语言改革, 因为决策者认为, 文言文与“现代性”不相适应, 必须现代化(欧洲化)。例如, Tong (2010 年) 指出是欧洲传教士创造了“汉语太复杂”的理念”, 然后, 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内化了传教士所创造的这种信念, 即汉语具有固有的局限性、不完美性, 甚至是缺陷。Wan (2014 年) 也持同一观点, 他说这个观念使得简化的汉字部分地成为殖民发明, 因为它源于“中国汉字对于现代世界来说太难”的殖民思维。这些论点并没有直接说明中国的精英和知识分子改革语言时甚至意识到他们正在复制这些殖民发明。但是, 正如 Tong (2010 年) 和 Wan (2015 年) 所做的那样, 中国的精英分子对自己的看法可以追溯到与中国接触并对中国进行写作的西方帝国主义者。

3.3 两段历史的比较分析

20 世纪初的中国和土耳其都有相同的目标: 改革他们认为是障碍现代化的语言。土耳其和中国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面临着类似的帝国主义威胁, 这使得它们现代化的动力更加强大。对于这两个社会来说, 要么选择现代化, 要么被殖民。因此, 这两个国家的官员都希望通过语言的标准化和文字改革来改革当时被认为是“落后”的语言。他们使用的方法也很相似, 都追求全国语言的标准化和文字改革。

最终, 中文和土耳其语通过上述改革成为了被边界限定的语言: 标准化和文字改革都有效地使其现代语言使用者与过去的书面作品隔绝开来。

大多数当代汉语的使用者不通过专门的学习,就无法流利地阅读文言文或看懂所有繁体字。在土耳其,能看懂奥斯曼文的人就更少了,因为改革的范围太广。因此,这些改革的结果代表了与过去的明显分野。

我想强调的是,一个殖民框架影响了汉语和土耳其语的现代化整个过程,从目标、方法到结果。为了改革一种语言(中文或者土耳其语),人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并接受该语言所存在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他们使用的文言文和繁体汉字与现代化不兼容。对于土耳其来说,知识分子认为阿拉伯文字和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多样化词汇是让土耳其落后的一个问题。

我使用的批判性比较视角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两个社会的精英都确信他们的语言对于现代化是不足够的。第一个阶段是当时的中国和土耳其的思想家开始通过西方对他们国家的理念来看待自己,是把来自西方的“东方主义”内化。他们开始认为他们的语言、习俗和宗教是落后的,因为西方学者是这样写的。第二个阶段是将“现代化”与西方联系起来。这种联系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和土耳其的思想家和决策者在他们的语言中积极追求“西方化”的努力,他们希望通过内化西方的语言模式来实现“现代化”。

4. 结论

总而言之,20世纪初中国和土耳其对现代性的理解是殖民构建,这种现代性的殖民性深刻地体现在两国的语言改革运动中。因此,语言改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每个社会的精英们被说服他们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错误”,以适应现代化。这是因为他们内化了东方主义,并将现代化概念化为必须效仿的欧洲特征。目前,土耳其语和汉语深深地与殖民历史交织在一起。试图‘回归’到前殖民时代是不可行的。我们被困在历史的猜测中,必须通过追求解放性实践,如妇女解放、酷儿解放和民族多样性,向前迈进。

参考文献

- Ahmad, F. (1988). Islamic Reassertion in Turkey. *Third World Quarterly*, [online] 10(2), pp.750–769. Available at: <https://www.jstor.org/stable/3992665> [Accessed 29 Apr. 2024].
- Anderson, B. (2016). *A Life Beyond Boundaries*. Verso Books.
- Blommaert, J. (1996). Language Planning as a Discourse on Language and Society: The Linguistic Ideology of a Scholarly Tradition.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20(3),

- pp.199–222. doi:<https://doi.org/10.1075/lplp.20.3.01blo>.
- Brenneis, D. (1998). The Matrix of Language: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4(3), pp.560–560. doi:<https://doi.org/10.2307/3034169>.
- Dirlik, A. (1996).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online] 35(4), pp.96–118. doi:<https://doi.org/10.2307/2505446>.
- Ertem, E. (2010). Ottoman and Turkish Orientalism. *Architectural Design*, 80(1), pp.26–31. doi:<https://doi.org/10.1002/ad.1006>.
- Gao, X. (2003). Women Existing for Men: Confucianism and Social Injustice against Women in China. *Race, Gender & Class*, [online] 10(3), pp.114–125. Available at: <https://www.jstor.org/stable/41675091>.
- Lewis, G. (1999). The Turkish Language Reform : A Catastrophic Success. OUP Oxford.
- Mignon, L. (2009). The Literati and the Letters: A Few Words on the Turkish Alphabet Reform.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20(1), pp.11–24. doi:<https://doi.org/10.1017/s1356186309990277>.
- Pennycook, A. (1996). Language Policy as Cultural Politics: the double - edged sword of language education in colonial Malaya and Hong Kong.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17(2), pp.133–152. doi:<https://doi.org/10.1080/0159630960170202>.
- Ricento, T.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policy: theory and method*. United States: Blackwell.
- Spivak, G.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Die Philosophin*, [online] 14(27), pp.42–58. Available at: <https://jan.ucc.nau.edu/~sj6/Spivak%20CanTheSubalternSpeak.pdf>.
- Tong, Q.S. (2000). Inventing China: The Use of Orientalist View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Interventions*, 2(1), pp.6–20. doi:<https://doi.org/10.1080/136980100360760>
- Tong, Q. S. (2010). Global Modernity and Linguistic Universality: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43(3), pp.325–339. doi:<https://doi.org/10.1353/ecc.0.0185>.
- Wan, D. (2014).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Planning and Reform in China: A Critical Perspective. 29(2), p.5.
- Wang, W. and Sun, C. (2015).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J.B. (2003). State Feminism, Modernization,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an Woman. *NWSA Journal*, [online] 15(3), pp.145–159. Available at: <https://www.jstor.org/stable/4317014>.
- Zheng, W. (2010). Creating a Socialist Feminist Cultural Front: ‘Women of China’ (1949–1966). *The China Quarterly*, [online] 204, pp.827–849. Available at: <https://www.jstor.org/stable/27917835>.

易蔚洋 (Derin Bohcaci) 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语言文化和社会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目前在复旦大学留学。他在伊斯坦布尔出生，九岁搬到台北，在该地长大。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亚洲思想史，政治社会学（特别民族主义研究）和汉学。